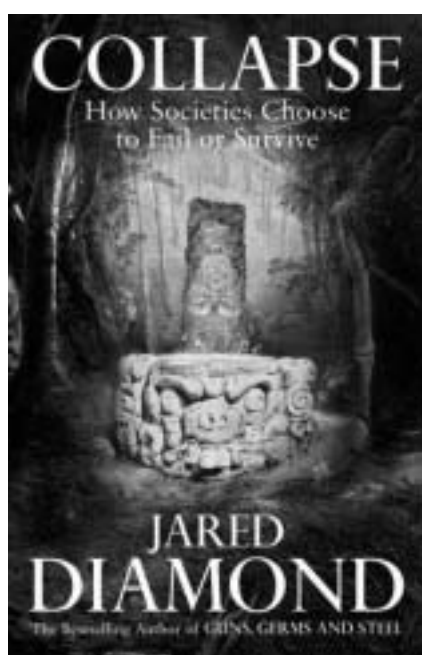


## 事關文明興衰的群體決策

● 陳心想



Jared Diamon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rvive* (New York: Allen Lane, 2005).

戴蒙德 (Jared Diamond) 是美國加州洛杉磯分校地理學和醫學院生理學教授。從生物地理學角度出發，戴蒙德曾探索了過去一萬三千年的人類文明，在不同的大陸上產生巨大差異的原因，試圖通過各大洲的可馴化植物和動物的地理分布以及緯度的長短來解釋文明的高下差別。這就是戴蒙德1998年獲得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圖書獎的名著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對文明發展差異的解釋。這種解釋基本上是從客觀的環境和生態的因素來看過去一萬三千年裏各大陸社會和文明的建立和興起，因此有環境決定論的嫌疑。八年之後，戴蒙德推出了又一巨著《崩潰：社會是如何選擇成敗存亡的》(*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rvive*，以下簡稱《崩潰》，凡引此書只註頁碼)，用比較的方法探討在客觀生態環境面前，人類的作為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也就是人類社會群體的選擇和決策怎樣影響他們的興衰存亡的。前者講社會和文明的建立興起，後者講崩潰，因此兩本著作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姊妹篇。

所謂「崩潰」，在這本書裏，是指在一定領地內一定時間裏的人口規模劇減，以及或者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複雜性劇降。《崩潰》一書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描寫了美國蒙大拿州的環境問題，為了表現人們面臨的社會與環境的互相作用，集中在一些個人的生活。第二部分描寫了崩潰了的古代社會，總結了五個因素的框架。導致這些文明社會之所以消失的五個因素是：一、生態環境的破壞；二、氣候變化；三、強鄰壓境；四、友邦的支

《崩潰》探討了人類社會群體的選擇和決策怎樣影響他們的興衰存亡。書中第一部分描寫了美國蒙大拿州的環境問題，第二部分描寫了古代文明社會消失的五個因素：生態環境的破壞、氣候變化、強鄰壓境、友邦的支持與否、社會面對環境問題時的應變能力。他給出了三個成功存活社會的故事，說明在嚴苛的環境裏，「崩潰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依賴於社會的選擇」。第三部分探討了現代社會中國家面臨的問題。最後分析了全球化時代的環境問題和對策。

環境管理的辦法，一是自下向上，如新幾內亞高地(面積小的社區)，社群中的每個人都熟悉當地的資源環境狀況，所以大家自覺保護資源，獲得可持續發展；一是自上向下，如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大面積的社區)，需要「中央」來宏觀考察環境和資源問題，制訂政策。介於兩者之間的社會很難成功，一是個人難以觀察到整體狀況，二是形成不了有足夠能力的「中央」集權治理。

持與否(復活節島是歷史上最好的一個展示出孤立導致滅亡的例子)；五、當社會面對環境問題時的應變能力。戴蒙德把這些作為「輸入」變量，把「存活」、「崩潰」和(如果發生了崩潰)「崩潰的形式」作為「輸出」變量，然後進行不同文明和社會的縱橫比較，以此來考察每個因素對社會文明興衰存亡的影響。復活節島完全由於環境的破壞而消失，皮特凱恩島波利尼西亞人是由於環境破壞和失去貿易夥伴，美國西南的阿納薩茲人是由於環境破壞和氣候變遷，中美洲的瑪雅因為環境破壞、氣候變遷和敵對鄰邦，格陵蘭挪威人由於環境破壞、失去貿易夥伴、氣候變遷、敵對鄰邦以及面對社會崩潰拒絕變革。而後戴蒙德給出了三個成功存活社會的故事，分別是蒂蔻皮亞島、新幾內亞高地農業成功和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的森林管理。這說明面對外在客觀環境，人們的反應問題的能力會造成不同的結果，文明社會若採取適當措施，仍可以保持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即使在嚴苛的環境裏，崩潰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依賴於社會的選擇」(頁21)。第三部分探討了現代社會，包括部分原因在於人口過剩的盧旺達的種族屠殺，與比較成功的鄰國多米尼亞共和國相比海地的失敗，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以及像澳大利亞這樣的第一世界國家面臨的問題。在最後一部分，戴蒙德總結了歷史上集體決策失誤的問題，並分析了現代大企業和全球化時代的環境問題和對策。

戴蒙德主要集中在人類社會應對環境問題方面。他把環境問題概括為十二種：

過去人類社會的環境破壞主要可分成八種，每一種的嚴重性因個別例子而有差異：山林濫伐和生物棲息地的破壞，土壤問題(包括侵蝕、鹽鹼化和肥力流失)、水管理問題、過度放牧、過度捕撈、新物種引進、人類膨脹以及平均每人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衝擊漸增等。這種種行徑猶如自掘墳墓，使得人類社會不知不覺走上毀滅之路。(頁6)

過去人類社會因上述八種環境破壞走上絕路。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除了上述八種，還新增了四種：人類造成的氣候變化、有毒化學物質在環境中沉積、能源短缺，以及人類將地球的光合作用使用到極限。(頁7)

環境管理成功的故事，戴蒙德展示出有兩條相反方向的治理辦法。一是自下向上，一是自上向下。採取哪種治理方式取決於社會規模大小。面積小的社會成功的例子是新幾內亞高地和蒂蔻皮亞島。前者是以村莊部落的生活形式存在，所以一個村莊即是一個社會或者社群；後者1.8平方英里。因為面積小，社群中的每個人都熟悉當地的資源環境狀況，所以大家自覺保護資源，獲得可持續發展。面積大的成功的故事是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這樣大面積的社區，一個人看到這一片資源沒了，還以為別的地方有，或者以為「那是別人的問題」而置之不理。這就需要有個「中央」來宏觀考察環境和資源問題，制訂相應的政策，自上而下進行環境管理。戴蒙德認為介於兩者之間的社會很難成功，一是個人難以觀察到整體狀況，二是形成不了有足夠能

力的「中央」集權治理。我們看自下而上，強調個人積極性；自上而下強調中央統一管理的重要。對現代全球化的社會而言，無疑大社會中環境治理的經驗尤其重要。

戴蒙德給出1868年之前的日本大社區森林管理作為成功的例子。針對森林保護，他們採取的措施，既包括積極性的，也就是推動種植，也有消極性的，即防止濫伐。為甚麼日本「自上而下」的森林管理能夠成功，而像古代復活節島民和瑪雅等，現代的盧旺達和海地等，面對類似的危機卻沒有成功呢？戴蒙德認為，除了客觀上日本環境的優勢，以及在危機之前就已經具備的，比如食草的山羊和綿羊很少，還有煤礦開發，海產品增長等客觀優勢之外，重要的是他們的精英和大眾都能夠比其他社會的人們，更充分認識到保護森林的長期利益。對精英而言，德川家族迎來了和平和繁榮，政治的穩定和充分的信心讓他們覺得，未來是他們的，有信心投資未來，並籌劃長期利益。比較而言，瑪雅的國王、盧旺達和海地的總統，都沒有信心預期他們的子孫可以繼任。而且，日本相對而言的民族和宗教的同質性，也使他更容易穩定。這種「自上而下」的辦法強調了國家制度和能力的作

用。在論述日本的成功之後，戴蒙德依然對成功的社會管理保持謹慎的態度。他認為，不管是領導者還是百姓，人們即使追求長期利益，行動也不一定總是明智的。他們常常依然追求眼前利益，甚至有時的行為對眼前利益和長期利益都是愚蠢的。其原因可以從戴蒙德非常精彩第十四章中找到，即：群體決

策為何會失誤。這一章是為現代人做的「殷鑑」匯總和避免群體決策失誤的路向標。

戴蒙德首先指出群體決策失誤和個體決策失誤的不同之處。一般來說，群體決策失誤的情況比個體的複雜得多，由於群體成員之間存在着利益分歧，即使在沒有個體決策失誤的情況下，也可能出現群體決策的失誤，也即「個體理性造成集體非理性」。同時還有人們的認知差異，複雜的情況也往往撲朔迷離。戴蒙德為我們描繪的群體決策失誤路線圖，有四個站(stops)，每個站都會引發群體決策選擇的失誤。

第一站，危機發生前，群體預計不到。那麼，是甚麼因素導致人們不能對危機做出預警呢？原因之一，沒有經歷過，沒有經驗。或者，雖然經歷過災難，但卻忘得一乾二淨，「好了傷疤忘了疼」。遠古沒有文字的時候，文明是靠口耳相傳保持下來的，不容易記住。即使有文字，人們也常常疏忽大意。比如公元592年，古代低地瑪雅社會度過了一次可怕的旱災。然而瑪雅王國的文字服務於帝王的頌歌，而不是難民的災荒史，他們沒有將對付旱災的經驗提供給後人。否則，他們的子孫或許就可以躲過二百多年後的又一次大旱。還有，錯誤類比也會導致人類不能預見危機。人們往往將不熟悉的環境與以往生活過的環境相比較。比對了倒好，比錯了就走錯了路。比如，就是由於對兩地土質的錯誤類比，古挪威的維京人到冰島後伐林畜牧，導致了災難。

第二站是，即使人們有所警覺，危機發生時也可能覺察不到。對此至少有三種解釋。第一，人類

危機發生前，群體預計不到，或因沒有經驗，或因疏忽大意。如古代低地瑪雅社會度過了一次旱災，但該國的文字服務於帝王的頌歌，沒有將對付旱災的經驗提供給後人。錯誤類比也會導致不能預見危機，如古挪威的維京人到冰島後伐林畜牧導致了災難，是由於對兩地土質的錯誤類比。

即使人們預感到了危機，也可能無能為力。利益分歧會造成得利的一小撮和受損的大多數之間的博弈困境。比如許多廠家公司理性地攫取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負擔轉嫁給社會。短期和長期動機的差異也會使人對未來的危機無動於衷。赤道地區的漁民用炸藥殺死魚群，明知道這會造成未來漁業的災難性後果，但一家的衣食就靠這些魚養活。

使用的技術手段還不夠高明。第二個原因比較常見：危機常常不聲不響，徐圖緩進。全球變暖是一個最好例證。通常這類現象只是一年比上一年差一點點，逐年惡化，就像逐步加溫煮「青蛙」的感覺。第三個未能察覺危機的常見原因是遠距離管理造成的，這是任何大型社會中的潛在問題。比如，今天美國蒙大拿州最大的伐木公司的總部並不在該州，而在西雅圖市。由於遠離現場，公司領導人可能想像不到他們的林場存在着嚴重的莠草問題。所以，為避免這種情況造成的失誤，上級領導要經常到基層考察。

第三站，就是假定我們現在已經預感到了危機，並且也覺察到它已經來臨，但我們可能會無能為力毫無作為，任由其發展。這也是群體決策失誤中最为普遍和驚人的。利益群體、個人利益分歧、問題和治理手段認識差異等，造成吵不出個結果，或者措施偏頗，或者錯失良機。「搭便車行為」也讓分散的大眾難以組織，造成得利的一小撮和受損的大多數之間的博弈困境。比如許多廠家公司理性地攫取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負擔轉嫁給社會，污水廢物廢氣殘渣危害水源和環境生態。再者，當事人若不具有長期利益也會理智地置潛在危機於不顧。但是，不管是精英還是大眾，當大家被綁在一條船上時，更可能做出好點的決策。比如在荷蘭，當精英利益和公眾利益捆在一根繩上，決策者們就制訂出符合整個社會利益的措施。荷蘭的攔海造田，地勢低窪，一旦大堤崩潰，堤內的百姓就會面臨洪水滔天的危險。荷蘭的富人和窮人都住在低地內，而不是富

人住高地窮人住低地。當局明白自己和國民風雨同舟，不可能免於堤壩破壞的滅頂之災，所以肯花費幾十億美元建造和加固堤壩。

另外，對危機的無所作為不僅緣於利益分歧的理性行為，某些非理性行為也害人不淺，而且所有社會成員都不能幸免。即使同樣一個個體，短期和長期動機的差異也會使他對未來的危機無動於衷。比如貧困人口，今天的飯都有困難，還怎麼考慮明天？你看赤道地區的一些漁民用炸藥和氰化物殺死和捕捉魚群，他們明知道這樣做會造成未來漁業的災難性後果，但一家老小的衣食就靠這些魚養活呢！

最後一項影響覺察危機後仍無所作為的因素被稱為「心理否認」。儘管某種預感提醒人們未來可能遇到的嚴重危機，但這可能在潛意識裏給人精神上帶來劇烈痛苦，因此人們的內心會抑制或者否認這種預感。直接面對危險的人只有憑藉這種心理狀態才能免除恐懼造成的精神威脅，保持神智清醒。

最後一站是，人們終於開始行動了，試圖解決問題但卻沒有成功。這個環節的決策失誤存在許多顯而易見的解釋。有時候是因為現實太複雜了，任務太艱巨了，非人力所能及也。有時候是因為人們努力太少，行動太遲，錯失良機。

為了展現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戴蒙德給出專章講中國，就是第十二章：中國，搖搖擺擺的巨人。按照戴蒙德的考察，中國面臨着嚴重的環境問題，前面提到的古今社會中的十二個問題，中國全部都有。中國這麼一個大國，人口佔世界的五分之一，又趕上急速現代

化和城市化，對資源的需求是驚人的，對環境和資源的破壞非常嚴重。面對環境的諸多問題，一定要重視決策和選擇，以扭轉局面。像中國這樣一個同質性很強的，一個中央政府的國家不多，可以集中起來辦大事。如果是辦好事自然好，如果是破壞性的，就更可怕。由於技術低下，和發達國家相比，資源的利用率很低，浪費資源的同時，造成大量的垃圾。比如，小型鄉鎮企業對環境生態的破壞。

面對十二個相互聯繫在一起的嚴重問題，戴蒙德駁斥了一些笑話一樣的觀點，比如「環境必須和經濟平衡」、「技術發展會解決問題」等等。但是，古代社會的教訓對現代社會還有用嗎？我們現代社會和古代社會有哪些區別呢？戴蒙德認為，最明顯的不同是現代社會人口遠比古代多，技術更有效，第二大不同是現在是全球化時代。正是這

兩點讓那些問題在現代社會更加嚴重，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古代社會的成敗中吸取經驗和教訓。

最後戴蒙德表明自己對問題的解決持謹慎的樂觀態度，其原因：一方面我們承認我們面臨的問題嚴重；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選擇去做，問題可以解決，但是必須作出兩類選擇：長期規劃和願意重新思考我們的核心價值，比如我們的消費觀念。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人們都過上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那麼全球消費和廢物製造將增加幾十倍。還有一個可以樂觀的原因是，現代全球化的社會有電視、書籍和互聯網，人們可以了解遠距離的社會情況，這樣更容易於信息溝通，便於管理。戴蒙德雖然指出，這會使偏遠落後地方的人們也看到了並仿效追趕發達國家人們的生活方式，但他忽視了也正因為全球化，造成群體決策和執行更加困難。

戴蒙德對問題的解決持謹慎的樂觀態度，但他指出必須作出兩類選擇：長期規劃和願意重新思考我們的核心價值，比如消費觀念。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人們都過上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全球消費和廢物製造將增加幾十倍。

##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6年12月號、2007年1月號

- |             |   |             |                                   |
|-------------|---|-------------|-----------------------------------|
| <b>第57期</b> | <b>2006.12.30</b>                           | 陳夏紅         | 我只向真理低頭                           |
| 王 雷         | 施米特的法眼與黎元洪的決斷                               | 火 源         | 新道路上的荊棘——李怡的《現代性：批判的批判》讀後         |
| 周良霄         | 淺論所謂「文化大革命」——為紀念「文革」發動四十周年而作                | 吳前進         | 「僑鄉」探詢：跨國主義的分析視角——李明歡教授《福建鄉僑調查》述評 |
| 余慕雲         | 對黎民偉與黎北海的評價——與周承人、李以莊商榷                     |             |                                   |
| 耿 波         | 相聲藝術傳統與北京城市文明格局的變遷                          |             |                                   |
| 郭台輝         | 鮑曼思想研究：探索新的分析範式——兼評鄭莉的《理解鮑曼》                | <b>第58期</b> | <b>2007.1.31</b>                  |
| 陸雪琴         | 傳奇文本和都市隱喻——從〈沉香屑——第一爐香〉說起                   | 郭培清         | 台灣與以色列軍事貿易關係探析                    |
| 魯明軍         | 藝術vs政治：被規訓的身體和被壓抑的現代性——上世紀八十年代藝術思潮運動的另一社會面向 | 王 霞         | 對天安門升旗儀式的政治分析                     |
|             |   | 張 超         | 在權利夾縫中追求人的尊嚴：當代中國大陸自由文學評述         |
|             |   | 張德強         | 論韓國新村運動的教育本質                      |